

# 借來的生命

## —— 中譯《動物農莊》因緣

用俗語說，中譯歐威爾的《動物農莊》是我「收山」之作，趁此機會不妨就翻譯這門功課試遣愚衷。我就讀台灣大學外文系的時期（1956–1960），翻譯並不是一門「重頭課」。朱立民老師那時剛從Duke拿了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回來，教一科翻譯，我是四年級生，選了。

那年考進台灣各大學的外文系同學，選的科目雖各有名堂，但為了出洋，多把精神放在「實用英語」上。朱老師選了Arthur Miller的《推銷員之死》作教材，要我們在堂上輪流即時翻譯。

大學畢業後，當年《現代文學》諸子各奔前程，但知王文興留台在外文系任教，白先勇在加州Santa Barbara校區教中國語言和文學，我自己的第一件差事則在Ohio州的Miami大學當講師，時維一九六四年。我跟英譯中國文學的因緣，自那一年開始。

在美國大學教授中國語文的教材，歷史悠久，教材多有選擇。相對而言，英譯中國文學，幾乎可說現成的譯本都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陳年舊作。那年頭要介紹《紅樓夢》，唯一可用的教材是老前輩王際真先生的Anchor Books。一個學期下來，中國泰山北斗的煌煌巨著在一班美利堅合眾國童男女童的心目中

只是一本集爭風吃醋之大成的言情小說。《紅樓夢》為何又可稱作《石頭記》？憑此譯本的簡易文理猜度，實難看出什麼道理來。

為了增補中國現當代小說的英譯教材，我跟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教授過去十多二十年合編了多本短中篇小說選給授課老師選擇。

在別人翻譯的舊作中選材、修訂和編輯的工作，感覺跟整理自己的舊譯作再版時可不一樣。首先，別人的舊作不是你挑選的，譯文之好壞，亦非你一人能定奪。公事公辦的譯文，沒有譯者投入的「感情因素」，文字看來就會拒人千里。

我運氣好，第一本我主動向香港美國新聞處要求翻譯的作品瑪拉末的《夥計》順利出版 (1971)。《夥計》故事，簡單說來，是一個「壞人」傷害了他的恩人後拚命追求做補贖的故事，一個非常接近俄國大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終生關懷的《罪與罰》情意結發展的因果。夏志清先生論中國新舊小說，認為一大缺憾是宗教情懷之闕如。(李豐楙和廖肇亨合編的《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論集》中「救度」一詞想與「救贖」同義。)

本文以「借來的生命」作標題，是一個 Confessional Note。我們唸外文系的人，看到人家值得外傳的作品，自己寫不來又想公諸同好，唯一的辦法是自己動手翻譯過來。當年鼓勵我翻譯《一九八四》的人，第一位是我老師夏濟安，第二位是舊交林山木。今日督促我翻譯《動物農莊》的人是多年老友詹德隆 (T. L. Tsim)，在此一併謝謝他們給我的鼓勵和支持。「戰爭是和平/自由是奴

役/無知是力量」——這種反常識、反理性的話，一定不能任由它代表真理。「大洋邦」代表的是什麼一種惡勢力，一定得通過翻譯讓世人知道。我的角色，因此只是借歐威爾的生命來扮演他的代言人。

《動物農莊》是《一九八四》的姊妹篇，除我現在準備付梓這個版本外，市上亦看到其他版本，特別是台灣多家出版社印行的。有此一說，一本偉大文學作品的翻譯，每二十年應是一個新世代，因為二十年來的風物、人情、語言在新時代的人聽來看來都「老套」了。此話作不了準則。十九世紀俄國大小說家托爾斯泰等巨匠的英譯幾乎由「奇女子」Constance Garnett (1861–1946) 一手包辦。過去十多年的時間，新一代俄國文學專家人才輩出，但「奇女子」的英譯沒被淘汰，或取代。不少人就是愛讀她維多利亞式的英文繼續做她的「擁躉」。我翻譯的理由不宏大，只是年初準備再版《一九八四》時的校訂工作令我有衝動接着翻譯這本姊妹作。我想借歐威爾再說一次這個恐怖惡勢力。

在《動物農莊》中，歐威爾把史太林和勢不兩立的對手托洛茨基雙雙變為別號拿破崙和雪球的公豬。因有讀者或BBC的聽眾不時問到：《動物農莊》是不是「反共」作品。歐威爾一直堅持他絕無惡意詆毀「社會主義」事業的意圖，動機不外是為民主西方社會留存一部《警世通言》，好讓他們在種種煽動的、危險的「社會主義」論調中保持清醒、提高警覺。

其實如果拿《動物農莊》作寓言看，折射出來的有關人類和

動物雙雙墮落的層面更見恐怖。動物先瞧不起用兩腿走路的人類，後來亦跟着墮落，自己也學着用兩腿走路。《動物農莊》端的是有關人畜墮落的今古奇觀。結尾一段文字，讀來更像有志怪色彩：

十二個嗓門同時憤怒地叫喊着。他們何其相似！如今不必問豬的面孔發生了什麼變化。外面的動物從豬看到人，又從人看到豬，再從豬再到人；但他們已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

劉紹銘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出版說明

今年是《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出版七十周年，一九四九年歐威爾寫就的這部反烏托邦小說，直至一九八四年才有完整的中譯本。一九八四年，香港前途未明，《信報》創辦人林行止邀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書的劉紹銘教授翻譯此書，自該年一月起連載其報紙內，連載既完，單行本同年由臺灣皇冠出版社出版，到一九九一年東大圖書公司購得版權再度出版。現在香港市面已難得見到這個版本，有的是臺灣不同譯本與簡體版本。我們選劉紹銘教授這個版本再版，一是其中的香港淵源，二是信服劉教授的譯筆。他對中國文學與翻譯的熱誠至耄耋之年還不減退，現在仍提筆重譯歐威爾另一經典《動物農莊》。

七十年前對極權社會的想像——改寫歷史、控制語言、人面識別、情緒監測，現在讀來並不陌生，劉教授說當年是帶着誠惶誠恐的使命感來翻譯《一九八四》的，並希望「在國人中多一個讀者，就多一分對極權政治的警惕」。我們曾着劉教授替這個香港版本寫幾句話，但他說書已經譯好幾十年，要說的話都說了，只補充當年乃根據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 *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 Texts, Sources, Criticism* 翻譯的，最後拋下一句話：「若歐威爾還在生，又懂中文，他準會問現在是人間何世！」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二〇一九年六月

## 東大版《一九八四》譯本前言

我翻譯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除了個人情感和知性的衝動外，不敢忘情忽略的，是香港《信報》林山本兄給我的鼓勵。難得的是他特闢篇幅，每天連載我翻譯這本並不消閒的小說。

《一九八四》並非像武俠或言情小說，難在千把字間出現什麼高潮。這部小說確是「益智」讀物，要好好的體味歐威爾個人對未來世界發展的憧憬，得靜下心來鑽研一番。

我在臺灣編報紙副刊的朋友頗多，但一直不願意強人所難，請他們考慮給我分日連載，就是這個道理。

八十年代中，臺灣的出版事業相當發達，也日見專業化。哪一類作家寫的書，幾乎都有旨趣相當的出版社接受。

《一九八四》這類翻譯，究竟應該投靠誰家門下，一時頗費思量。後來有好心的朋友建議我寫信給皇冠出版社聯絡試試看。果然一通音訊，水到渠成。

皇冠月刊連載了幾章後，一九八四已到急景殘年。編輯部朋友來信說，此書既要出單行本，不妨放棄每月刊登一章的計劃，結集在年底前發行。

《一九八四》因此也在同年跟臺灣讀者見面。就我所知，這

是唯一的全譯本。在拙譯面世前，坊間有兩三個版本，我都拜讀過了。發覺一來刪節的地方不少。二來譯文「以訛傳訛」。那就是說，甲本的譯文，乙本和丙本的譯者拿來參考，甲本出現的誤譯，也如數的出現在乙丙本內。

《一九八四》在中國大陸的譯本，公開出現的比較晚。朋友給我「搜購」到的，只有廣州花城出版社的版本。譯者是董樂山。出版年份是一九八八年六月，只印了四百三十冊。

歐威爾這本死前兩年咯着血寫成的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價值在哪裏，我在序文〈日見伸長的影子：歐威爾與《一九八四》〉已有交代。讀者千萬別放過的是收在附錄的〈大洋邦新語〉。依歐威爾看，極權統治者要千秋萬世的騎在人民頭上，最直接也最恐怖的手段無疑是「思想警察」。但摧殘人性更徹底的方法，無疑是消滅歷史與破壞語言。正因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媒介，要實施愚民教育，最有效的途徑莫如把「不合時宜」的文字刪除。這一關鍵，已在〈大洋邦新語〉闡明，茲不贅。

二十年來，我翻譯過不少英美小說。有些是為了滿足個人趣味，如馬拉末的《駭計》、辛爾的《傻子金寶》。但以誠惶誠恐的「使命感」從事的，只有《一九八四》。

拿我這年紀的人來說，今天在香港和臺灣這些地方長大的二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是幸福的一代。借用董樂山先生的話：「如果說，我們今天讀來覺得書中描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有幸沒變成事實的話，那麼這並不是說將來就不會出現。我們最

好還是把它看作一九九四年或更遠一些的未來可能出現的危險，而有所警惕。」

董先生的話，是一九八六年說的，那時「國內形勢」，還真「一片大好」。可是六四屠城後，中共政權，又走回頭路。當大陸老百姓的人倫道德、價值觀念和對黨的形象全被機槍坦克粉碎之餘，「老大哥」不得已，只好重新祭起像雷鋒這種「迷理部」創造出來的英雄偶像來，讓「普理」學習、膜拜。

雷鋒這樣一個人物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一九八四》有詳細的解答。

《一九八四》的意義，因此遠超書名所記的年份。我個人的希望是，在國人中多一個讀者，就多一分對極權政治的警惕。

為此原因，我非常感激平鑫濤先生慷慨的把版權交還給我。

更感謝東大圖書公司劉振強兄毅然答應重排出版。我趁再版之便，把譯文文字若干沙石都撿出來了，希望盡量做到譯文唸起來時不太像翻譯的味道。

劉紹銘識於威斯康辛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五日